

汪伪的留日学生教育*

周攸正

内容提要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为了推行奴化教育向日本派遣了一些留日学生,沦陷区也有部分学生自费留学日本,那么他们的情况如何呢,本文在梳理档案的基础上,就当时留日学生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描述,以图再现一段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 汪伪政权 留日学生 奴化教育

一 留日学生的考选和汪伪的预期培养目标

汪伪政权的教育方针的基本精神是“一扫以往的排日仇日教育,实现真实的亲日友日教育”,为了培养更多可加以利用的高级人才,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这一事项在汪伪政府成立后很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接到日本驻华大使馆转交的日本外务省的考选庚款留日学生甲乙两号文件的命令和“1940年留日公费生华中补助费名额为二十五名(即庚款生)的函知”^①后,1940年6月27日,汪伪政府

* 本文的写作得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郭俊 基金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支持,谨致谢意!笔者要感谢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华教授的对本文的悉心指导,还要感谢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的马俊亚副教授对本文的帮助。

① 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伪教育公报》,1940年8月15日,第8期,第29页。

刚刚成立尚喘息未定之际，“留日公费学考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在伪教育部长赵正平的亲自主持下在南京召开了。考选留日学生的办法由该委员会决定。1940年伪留日公费生考选委员会的委员长由赵正平亲自担任，副委员长为教育部次长樊仲云及戴英夫两名。由上可见，教育部对留日考生的考选异常重视。

第一次考选留日公费生初试日期为1940年7月25日，由上海、南京、汉口市教育局，苏、皖、鄂省教育厅自行在本地举行。其中初试考国学常识一门，作文二题；复试考四门，国文、外国语、数学、自然科学，并且增加物理、化学的考题数量。由此可看出，汪伪政府更注重选拔的是技术实用型的人才，这与其以技术教育为领先的政策是一致的。当时《教育建设》的时论——《留学生是以兴国亦是以亡国》^①也明确提出，汪伪需要的是有“亲善”和“实用”特征的留学生。除了这两点外，汪伪的预期培养目标是关于思想方面的，希望留学生在日学习期间受到日本的同化，思想上重新认识中日关系和中日战争，要达到汪精卫1941年访日时的演讲中提出的认识到这场战争是“长兄虽然打了兄弟，但并不是要将他打死，仍然要和他同心协力地复兴家道”。^②伪教育部招收的公费留日生范围一般为汪伪能够直接产生影响的地区，包括江苏、浙江、湖北、广东省和南京、上海、武汉这三个特别市。^③为了方便中国学生能够在出国前熟悉日语，汪伪政府还开办了杭州东南学院此类日语学校，“以培养留学人才为号召，募收失学青年”。

根据预期的培养目标，汪伪对派送留学生学习的专业有所限

① 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伪教育建设》，1940年10月10日，第1期，第7—8页。

② 汪精卫：《汪主席访日言论集——主席手撰“我们本来的面目”》，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处印行，1941年版，第27页。

③ 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伪教育公报》，1940年9月15日，第10期，第15页。

定,当然有学生投报志愿与其要求相符。但如1943年的由江苏省公派的陈某某,赴日本“半年后因受省座指派入日本大学经济部”,而不能随意的改换专业。但留学生自有办法,如陈某某通过“再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理科”^①的办法改换了专业。另一办法是通过在同一个学校变通专业,如限定专业为教育学的萧某某,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再选择入该校的理科,学化学。^②虽然汪伪政权行政院1941年又令教育部修正《国外留学生规程》,意图加强对学生选专业的控制,但是这种形式化的制度并不能限制活生生的人。而据日本文部省对留学生甲号文件,留学生完成“东亚学校受日语及其他预备教育”后,“即可入各人所希望之学校”^③,并无特别限制。汪伪的限制专业的“委托培养”形式并未起到实质效用。

公费考生录取之后,一般必须到南京听训二日后再东渡,期间一切开支均由教育部承担。汪伪政府欲“招安”对这些未去后方的青年才俊,一方面表现为训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一定的经济收买。虽然汪伪的财政并不充裕,且又在战时,但是对于留学生的经费却非常宽裕。就听训活动所需款项随每年的物价上涨而上涨,此项经费每年均由行政院直接安排财政部总概算“总预备费项下如数拨交教育部”^④,决不克扣。

汪伪也允许一部分自费生留日。1940年申请需要填写简单

① 陈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② 参见萧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③ 驻华日本大使馆昭和十四年度选拔留学生采用要纲甲号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档案,二〇一七——174。该文件有甲乙两号,由日本文部省制订,再由驻华日本大使馆转发日军占领区各伪政府。

④ 《1942年8月——1944年8月度选拔留日补助生支出临时概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政府教育部档案,二〇〇三——4206。

的“自费留学生考查表”一张。^①在汪伪政权稍事稳定后,1941年5月重新颁布的《修正国外留学生规程》对自费生专列第三章加以控制,规程规定自费生每学期须将上学期之经过及研究之成绩,连同主任、教授证明文件,呈请主管留学机关证明,分别呈送伪教育部驻日管理留学机关审核后转教育部备案。一学期不报者,管理留学机关应予警告,两学期不报者,取消留学资格,并勒令回国。^②自费生有特别成绩者,经教育部审定认可后,也可得享受各本省市奖金补助。但是在享受政府奖金的同时,也要受到政府对公费生的同样限制。

总之,留日学生虽然被吹捧为中日亲善的象征之一,但实际上汪伪政府希图他们将来成为“复兴事业”的技术工具,而对留日学生的控制却比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要严厉得多。其实质正如日本对当时的台湾殖民地的奴化教育一样,费正清指出:“日本人提倡包括孔孟思想科学、日语的(小学)教育,但日本人不愿意制造知识分子。”^③

二 关于留日学生的经费

(一) 日汪官方背景的各种津贴补助

津贴补助的第一种是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庚款津贴。据1937年12月日本外务省的调查,七七事变后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403人,其中外务省给予庚款补助的占94人。占当时整个

① 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伪教育公报》,1940年7月15日,第6期,第23页。

② 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伪教育公报》,1941年7月1日,第29期,第4—11页。

③ 费正清著,薛绚译:《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7月初版,第388页。

留日学生总数的将近 1/4。抗战爆发至汪伪政府成立前,日本外务省对中国留学生的庚款津贴依然继续。如 1935 年自费入东京日本大学的朱某某为补贴生活,在 1938 年“考得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月给四十元的公费”,且“系庚子赔款移充”。^①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战结束。

另一种是汪伪政府的留学津贴。教育部长赵正平在第一批学生赴日的当年 1940 年 11 月 19 日向行政院提出要求拨发留学津贴。虽“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就庚款项下每月给日金五十元”,赵觉得“处此物价暴涨之际,委实不敷应用”,就以此理由向行政院呈文提出:“为免半途辍学起见,凡成绩优良之留日学生,拟请酌给津贴。”^② 1940 年 11 月 27 日,行政院“第三十五次会议正式决议通过留日学生津贴办法及经费支出预算书一案”^③,该规定将补助额度上升,“每名每月给津贴费合国币五十元”。^④ 据陆某某个人自传的记载,“1936 年法币七十元,可换日金百元”,当时一“俭朴”的留日学生“每月七十日金”就可生活,即相当于“每月只需法币五十元”。^⑤ 而自“1937 年 7 月,对日抗战开始,三年之间,法币信用毫无变动”。^⑥ 在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日伪华兴银行发行的伪券很长时间都是与法币等价联系的^⑦,所以 1940 年汪伪的国币五十元津贴=法币五十元=日金七十元。很显然,一旦获得汪伪政府的留学津贴,留学生就可应付在日俭朴生活所需。

① 朱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② 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伪教育公报》,1940 年 8 月 1 日,第 7 期,第 21—23 页。

③ 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伪教育公报》,1941 年 1 月 1 日,第 17 期,第 1 页、第 12 页。

④ 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伪教育公报》,1941 年 1 月 1 日,第 17 期,第 1 页、第 12 页。

⑤ 陆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⑥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6 月第 1 版,第 492 页。

⑦ 此处系据南京大学历史系马俊亚副教授提供的参考资料。

更何况公费学生们本来就有每月日金五十元的生活补助。以此来看,汪伪政府在经济方面对留日学生应属相当的支持。

第三种来自于一些有日汪官方背景的文化团体和企业。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受到“文化团体等”资助的共有 38 人^①,除了一些文化团体等直接资助学生赴日留学之外,还有一种间接资助的方式,即由汪精卫、陈群等主持的文化团体“中华留日同学会”出面,举办留日预备班,其学生是免费学习并提供食宿的。

日汪各种官方背景的留学津贴补助,是有目的的。细究其原因,笔者以为,在汪伪认为,资助青年留日此举一则对加强中日亲善,沟通中日文化有极大的意义;二则青年在日学习期间会受到日本的同化将来回国后可以“接受”并加入汪伪统治阵营;三则可以借助日本的科学力量,以培养更多实用型“建国人才”。而在日本方面,除了包含以上的三个方面之外,从长远方面讲,日方希望在思想上认同了日本的留日学生回国后能够成为他们最好的控制中国的“买办”和“助手”;从短期利益来看,可为汪伪培养更多的高级技术人才,对振兴占领地区的内部经济,改善民生和稳定民心有直接的效果,有利于日军的“外苦内乐”的战略方针实施,以期最终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总之,要实现以上的目的,最基本的就是要拨付足够的学习生活经费,保证留学生能够完成学业。因此,当时所有在日的中国留学生,自然都成了日汪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资助收买的对象,且这些经费成了留日学生的主要经费来源。

(二) 留日学生自筹的经费

自筹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留日学生自家的家庭资助和他们在日

^① 《留日学生学籍科别人数统计表及学费来源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6。

自己打零工所得两个方面。留日学生中家庭资助的自费生并不占留日学生的主体,据1946年5月的《留日学生学费来源统计表》,被统计的456名学生中,其中学费来源为自费的仅有117人,占总人数的1/4多一点。^①

留日学生通过自己在日打零工补贴学费的情况较少,一般对于一些赴日已有数年,学有小成,能够在日找到工作的学生才有可能。如七七事变后留日继续未竟学业的柳某某,1940年自东京齿科医学专门学校本科毕业后,为了补充生活费和学费,在医学院里担任过副手的职位。^②

考得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庚子赔款作为学业的补助,事实上在很多留日学生看来,并不是件极可耻的事情。他们心里觉得此举是既“消耗的是敌人的粮食与物质,(中国学生)又求到了学问”,但“中国人终究仍是中国人,造就出来的人才回国后是为中国用的”^③,尤其日本败迹已现时,留日学生们更是亲身认识和体会了这种想法的现实性。

从整体上不难看出,日汪双方政权设置对留日学生的学费补助才正是推动青年学生赴日留学的主要动因。但让日汪遗憾的是,历史的发展态势并没有给日汪政府足够的时间完成此项计划。在时间方面来讲,对于已经有相当判断力的青年人,要奴化其思想在短期内是很难奏效的;其次,最优秀的留日学生一般是进入日本的官公立大学(如京都帝国大学)去攻读,但要想在此类学校毕业,先要进入第一高等学校读“两年零六个月”^④的预科,然后再上三

① 《留日学生学籍科别人数统计表及学费来源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6。

② 柳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③ 孟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65。

④ 杨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65。

年大学,共需要五年半的时间。战时日本政府将“高等学校课程由三年半缩短为二年半”^①,汪伪派遣第一批留日学生是1940秋季到日本的,入日本最好的官公立大学的学生至少要到1945年夏天才能毕业,这时离日本投降只有一二月了。这些汪伪设想中的“最优秀人才”哪里还有机会承担什么“复兴救国”的重任?

三 沦陷区青年学生选择赴日留学的原因

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已将大批高等院校迁往云川贵等内地诸省。但是,这使得在沦陷区内的中学生升学成了很大问题。如江浙皖的中学生毕业生如果不想入日伪的大学继续求学,那就必须“远涉千山万水”,到内地的成都、重庆、贵州、昆明等城市报考大学,或者到“临近的几个未沦陷的省份去考大学”。^②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赴日留学的学生没有或不可能选择去国统区求学呢?据笔者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留日学生归国后交与国民党留日资格甄审委员会中的60余份自传材料的详细分析与整理,认为其客观原因主要有:

(一)“绕到后方需要一笔很大的款子”。^③对于路程遥远的大后方,很多学生无钱奔赴,日军战火烧到之处,财物为敌抢掠一空,往往全家生活只有“赖变卖为生”。^④

(二)因为父母家庭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双亲年老身临其病,长兄临行时再三嘱代侍双亲”。^⑤更有的是“母亲年已高迈,行动

① 邵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67。

② 王觉非:《逝者如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116页。

③ 戎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④ 李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一—15357。

⑤ 秦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不便,难胜跋涉之苦”^①,无法与其一起去投奔已在重庆的父亲。

(三) 因病不能去后方。战争爆发后,有的青年正好“将膝盖关节摔坏因身体的关系,自悔不能到抗战地区,尽国民之责。”^②

(四) 日伪封锁交通,对一些青年进行监视和控制,也使很多优秀青年无法行动南下。1940年夏从辅仁大学毕业的王某“本想去后方参加抗战工作,适值那时沿途盘查甚严,先我们的一批(同学)竟在邯郸车站出了事,下落不明,所以我们只有暂时搁置下来”。^③

据1943年由安徽赴重庆报考大学的王觉非的回忆^④,他途中在渡过鄱阳湖时先遇到湖匪,后在经过封锁线时,“怕他们开了汽艇追来,搞不好,命都会送掉”。沦陷区学生要想去后方,就要“义无反顾”^⑤,不怕危险了。

那么去内地既然“关山万里,飞渡无方”。如果想继续求学,只有留在沦陷区上大学和留学日本两条路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赴英美等国留学极为艰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与英美开战,沦陷区的青年更是毫无可能,只有服从现实了。具体来说,青年学生赴日而没有留在沦陷区有下列几种原因:

(一) 沦陷区内的大学教育质量很差,而日本大学教育水平较高,并较国内安定。高校内迁后,沦陷区“间有一二开学者,非特其教育方针被日人所操纵,即设备方面亦皆破坏无余”。^⑥“以至沦陷

① 姚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② 留日学生读书报告和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9。

③ 王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267。

④ 王觉非:《逝者如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135页。

⑤ 王觉非著,《逝者如斯》,第119—123页。

⑥ 毕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区中的大学,实无求学之价值”。^①

(二)虽然伪政府通常对专业范围有限定,但赴日留学者绝大部分是学理工农医类的,不是以“训练学政治经济的汉奸”^②为直接目的。正是因为是去学一技之长,这一点为众多留日学生自身心中认同他们此行,并不是去直接的助纣为虐的心理底线。

(三)想到侵略我们的敌国去看一看。“日本是我们世代的仇人,它侵略我们,蔑视我们,到底它自己本身具有怎样的力量?为什么她可以能够睥睨世界,为什么她可以侵略我们”^③,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④

(四)抗战初期的失败,中国的软弱,也使青年学生认识到“现代战争亦即科学之战争也,故科学人才众多之国家,于战争中即可占优势”。^⑤要抵抗日本就先要研究日本,学习日本之长处,而留学日本即为一佳途,对于正当求学之年的他们来讲,“得机深造,学成专门”,“珍重有为之躯,以备将来之报”^⑥,这面对当时的现实也不失是一种办法。

(五)“沦陷区中的敌人之瓜牙遍布,大有 讪者诛、偶语者弃世之恐,而尤对曾受高等教育者为然”。^⑦对于很多当时受到监视的青年,无奈之际赴日留学也不失为一条出路。

(六)也有家长考虑到子女的将来出路,或因家庭经济关系无

① 戴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② 孟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65。

③ 陈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杨某某自传,五——15357 和朱某某自传,五—15355 均同时提及该成语。

⑤ 毕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⑥ 姚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⑦ 毕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力供子女上大学,就同意或鼓励其去日本公费留学;或考虑到战争的持久,而不在其子女的一人之力。仲颖魁的父亲告诫他“救亡图存,不在一朝一夕,万须具有能力方克达成目的”。^①

(七)“沦陷区与日本国内交通比较方便”。^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欧美更殊为不易,而内地也不易到达,这种情况使得去日本求学相对便利。

(八)对于公费留日学生来说,可节约一大笔费用。^③去日本一则物价便宜,二则有部分政府的津贴,就“可以减少家庭中老父亲的负担,不用老父亲为我找款读书”。^④

总的来说,大部分沦陷区青年在国内是不是将选择留日作为自己的人生道路时的心情非常复杂。既要想自己不虚度青春,有所作为,又要避免成为敌人的傀儡接班人。对公费生和家境贫寒的同学来说是“不得不可耻地接受敌人的资助”^⑤,这恰如戎清松所讲:“我和几个同学怀着不安的心情到了日本。”^⑥

四 留日学生在日本的学习情况

在日本,汪伪对留学生的管理机关是留学生监督处,设在驻日大使馆内,设专员一人,由教育部荐任选派,另有事务员助理一人。但据战后1946年的统计,当时散布在日本各大城市的各省留学生有434人,对于编制仅为二人的办事处来讲,是不可能对留学生进

① 仲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② 姚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③ 姚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④ 王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⑤ 陈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⑥ 戎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行非常细致严密的监控,某种程度上讲,办事处只是一个签发证件、处理学生请假等杂务的办事机关罢了,对于留学生的干涉很少。但留日学生并不自由,他们的日常生活会被日本警察监视。下面就分别对他们从留学生活进行详述。

(一) 日语补习学校和大学预科

东亚日语补习学校是不会日语的中国学生的第一个学习的落脚点,班上的“学生都是中国人”^①,这给很多第一次踏上异国的中国留学生们一个缓冲的机会,可以在六个月的补习时间里逐步适应日本的生活。中国的留日学生“大都为国内优秀分子”^②,都能较顺利的通过语言关,然后就可以根据各自的希望报考学校,伪政权对于专业有限制,但对于学校没有限制。

日本大学和大学预科的招生考试,一般在每年春季的“二三月间”^③,对于要进入预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九一八事变后日人为统治思想计,予“一高”特开班,收容留学生,其他各校不予收留。^④在1944年春季日本政府变更了考试方法,“类似国内之联合招生”。^⑤中国留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愿意的入读的预科学校而不仅限于一高。如杨允丰投考了均有悠久的留学生历史的“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高等科、东京工业大学附属预备部、及东亚高等学校”三所学校。中国留学生在“一高”入学后,与日人同居同餐,惟分班上课。^⑥在太平洋战事发生之前,日本“国内未受战事影响,固仍不

① 王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② 大东亚教育座谈会记录,《伪教育建设》,第六期,1942年3月10日,中国教育建设协会出版,第14页。

③ 姚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④ 李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⑤ 杨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⑥ 李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失为良好之求学处”。^①汪伪早期到日本的留学生的日语补习和一高生活应该是较为安定的。

(二) 志愿选择和考大学

日本高等学校毕业后,留学生就可报考大学,开始正式的大学阶段的学习。这是对很多学生来讲,面临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汪伪对于留日学生修业年限和志愿专业规定为被“选派留日学生在日本留日年限定为四年或五年,应以修业理工农医四学科”为主。^②对于抗战时期留日青年学生来讲,他们很关心如何能使中国在国力上有所“实际”的进步,希望中国有强大的现代工业技术,所以学习一门较为实用的工科专业也成了当时的正常选择。如杨某某“见到国内科学的贫弱,故欲投考理工方面”^③,中国留学生中不乏聪明有志的青年,很多人能够闯过“难关”——第一高等学校的考试,考入日本著名高校。女同学孟广璉在东京工业大学的入学考试中,“结果以二百余人的报考者,我又万幸被录取为第一名”。^④周某、游某和杨某都考入了日本著名的京都帝国大学。

(三) 学习情况和战事对学习的影响

由于汪伪时期的留日学生的留学期间处于特殊的国难时期,大家亲身体味并认识了弱国被人欺的苦涩和无奈,则对于学业的专心和努力更是有一种不同与以往留日学生的动力。留日学生们抱定的态度,“学业未完成之前虽受任何艰苦亦该忍受,否则半途而废,为国家,为个人亦不应该的”。^⑤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① 岑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档案,2017——174。志愿的选择的详细分析见本章的第二部分——留日学生的考选和汪伪的预期培养目标。)

③ 杨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④ 孟某某(女)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65。

⑤ 杨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65。

留学生们“精神上与物质上均受很大痛苦，唯有忍辱自重，专心求学，待学成回国效力，为留学生唯一之念愿”。^①如毕某某“在学期间，每日清晨即赴校，课毕后则埋首于图书馆及试验室中，至夜深始归，恒三年如是”。^②陈舜翘则经过艰苦学习，在历年来中国留学生很少得到正式文凭的女高师“顺利拿到了文凭”，“以‘正生’名义毕业，得到教员免许状”^③，当时留日学生在校的学习情形，官方的留学生办事处发回的调查报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就大体言之，则现在之留学生其成绩及品行均较事变前为优”^④，很显然，据前面章节的分析，留学生的求学目的并不一定就都是“求生活”这样的简单，但是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在学业上超过事变前的学生，并获得国内驻日官方管理机构的肯定，这一点是很值得钦佩的。

日本的大学课程一般是三年的学制，因为战争的原因，改为二年半，授课时间的缩短，以致一高的“各课皆草草教授，一年半中即将高等数学修毕，不免有生吞活剥之感，固已象征日本之日暮途穷也！”^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本的轰炸也影响了学生正常的学习，尤其是在大城市的学生，更受其害。“美机时来空袭，我们都疏散到离东京较远的地方去，读书比较不方便”。^⑥而在东京女高师的董某某虽然知道东京是“每日警报空袭”，但为了完成学业，

① 杨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65。

② 毕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③ 陈某某、萧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④ 公自费留日学生调查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档，2017——505。

⑤ 李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⑥ 姚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坚持“在紧张畏惧的空气中艰苦的读完了数学系的全课程”。以致当她 1944 年 9 月“毕业证书拿到手时,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还是惭愧”。^①

五 留日学生在日本的生活情况

关于当时留学生的生活状况,从官方的角度来看,享受庚款津贴的留学生“在东亚学校期间内月额补给金(日金)五十圆”^②,另外,汪伪教育部“每名每月给津贴费合国币五十元”^③(可参照前章关于留日学生经费的分析的第一部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生活还并不困难。

那么,就留学生自己来讲,他们对留日期间的生活有什么真实体味呢?总的来讲,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留日学生生活情况较为稳定。汪伪第一批留日学生之一的岑某认为当时日本“未受战事影响,固仍不失为良好之求学处”^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生活情况就不如从前了,有留学生说,“日本国内空气日形紧张,留日学生更受敌人严厉监视和限制,环境恶劣,无以复加,精神上所受种种刺激毕生难忘”。^⑤对于中国学生的行动,“外事警察特别注意,学校的中国学生有几位被捕,所加的罪名是思想犯”。^⑥其次,日

① 董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67。

② 驻华日本大使馆昭和 14 年度选拔留学生采用要纲甲号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档案,2017——174。

③ 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伪教育公报》,1940 年 1 月 1 日,第十七期,第 12 页。

④ 岑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⑤ 朱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5。

⑥ 留日学生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9。

本本土人民生活水平下降^①，留学生们的物质条件自然也随着及日本国力的衰弱而不断下降。当时日本的“人民生活已甚艰苦”^②，留学生们“日常生活也窘迫万分，柴米油盐几乎用钱都买不到”。^③

当然，最具威胁的就是美军对日本各大城市的轰炸。1942年4月18日，从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6架B-25飞机轰炸了东京、横滨、名古屋和神户等城市，这个消息使日本举国震动。而在留学生董某某看来，“东京是首都，想不到来轰炸还是这样容易。自此日本政府的威信更一日不如一日”。^④到此时为止，汪伪对中国留学生的奴化教育的过程设计再巧妙，资助再多，手段再隐蔽，日本的警察对留日学生的监视和限制再严厉，但所有的这一切都随着东京被轰炸、日本很可能会战败这一事实所动摇了。

留学生的家长们得知东京被炸后，很多来信催促自己的子女回国，是否留下来完成学业和个人意志、抱负等有关系。“母亲的每封来信都催我回去”，董某某战后的自传里这样回忆。^⑤不过坚强的董小姐还是坚持“读完了数学系的全课程”，直致1944年9月才回国。而如王兆民在“B-25到东京轰炸后的(日子)以后就接到父母亲的来函，并电报催我赶快回家，于是请准了旅行证，买了票回到我可爱的家庭中来”。^⑥

① 留日学生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9。

② 留日学生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9。

③ 杨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④ 董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67。

⑤ 董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67。

⑥ 王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六 留日学生的爱国反抗活动

留日学生在日本虽然并不直接参加抗战,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的爱国之心并未泯灭,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所感反而更加激起很多留日学生振兴祖国的决心和信心。在笔者详阅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百余本个人自传中,有很多关于留日学生们暗中集会或者参加各式反战行动的记录,但是很奇怪的是,在这么多留日学生的自传里面,当提及关于日方侦知留日学生们暗中集会或者抗日反战,笔者发现并没有一例是由于中国同胞告密和出卖所造成的。因此就我看到的材料来判断,在留日学生中间的“叛变者”是极少的。拿了补助完成学业的孟广璉在完成学业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的学问求到了,消耗的是敌人的粮食与物质,日本费尽苦心造就一群留日生以备他日亲善之用,孰知中国人终究仍是中国人,造就出来的人才回国后是为中国用的,究竟谁聪明只有天知道。”^①

七七事变后没有归国的留日学生,成了后来的部分留学生“反奴化”思想产生的来源。陈某某进入预科第一高等学校时,就遇到了反日的留日学生。陈在自传回忆道:他们“告诉给我们一高中国留学生传统抗日精神,对那些来自满洲的学生,更时时做着改换思想,输入祖国意识的工作”。^②据另一位 1942 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李某某的自传,当时在一高的留日学生“对方入学而沦陷已久之台湾东北同学,尽力唤醒其爱国心,改正其错误观念,”效果是“无不被说服同化”。

① 孟某某(女)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65。

② 陈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当然,由于日本警察的严密控制,尤其是太平洋战争之后,有组织的集会或者传播抗日思想的活动是很难展开的,因此,留日学生反抗更多的是表现为各种各样的个人行动式或者无声的心里上的反抗。如北海道帝大专门部王某某在日看到“凡诸劫夺我国物质等之陈列”,加强了他“‘国必保,日必排’的观念”。^①“置身敌国”的邵某某在双十节国庆日那天“更念我中州人士”,而“秋雨连绵,天愁地暗”,更令邵“倍加愁肠”。^②

七 对留学生留日行为的看法

对于如何看待当时所谓的“伪学生”,在战后的中国实在是个很敏感的话题。当然,我们看待很多历史的事情不能意气用事,要抱一种平和同情的心态去看。在事隔 20 余年的 1971 年 5 月 9 日,《中国时报》副刊有南宫搏先生的《于〈知堂回想录〉而回想》,有这样一段关于对于“伪学生”的议论,笔者以为这一种看法可以用来参照对汪伪时期留日学生的评价,特辑录如下: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指斥学界名人傅斯年……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受时,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连“伪学生”也说得出口!——他说“伪教授”其实也可怒了。要知政府兵败,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敌伪的统治下,为谋生而作一些事,更不能以汉奸目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况,平常做做小事而谋

① 王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67

② 邵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57。

生,遽加汉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①

汪伪时期的留日学生是中国留学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留学群体,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是毕竟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留学生的风貌。据以上的基于史料的分析,该时期的留日学生绝不是中国留学史最受政府(汪伪政府)重视和关照的一群特殊人物,也更不是那个时代的最幸运儿。虽然身在日本,但是留学生们的人生轨迹是无法脱离当时的历史大背景的。笔者以为他们也是在那个“大时代”中生活颠沛的一分子,他们的苦闷和欢欣是紧紧的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一群合格的中国留学生。

1948 年 11 月国民党教育部发布高字第 64379 号通告,将归国后首批接受并且全部通过的教育部抗战期间留日学生资格甄审合格的留日学生名单,“计有沈叔君等一百三十九名”公诸于当时的报纸。^②自此,部分留日学生的名份终于尘埃落定。

(作者周孜正:1976 年生,江苏无锡马山灵山管委会办公室)

(责任编辑:刘 兵)

① 梁实秋著:《梁实秋怀人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年 2 月第 1 版,第 276、277 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361。